

编者按 2009年 6月 27—28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以“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性与政策性”为主题举办了1次青年论坛。与会者围绕“国际问题研究中的理论与政策”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方向”两个议题,对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的关系、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思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本刊“主题讨论”特刊载部分与会者为此次论坛所提交的书面发言。本刊主编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为此组讨论文章写了引言。此外,研讨会上,约瑟夫·奈等美国学者的相关文章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经作者及原载刊物授权,本刊将约瑟夫·奈及李侃如的两篇文章译成中文。本刊刊发,以飨读者。

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节的 症结与出路

王缉思

自担任《国际政治研究》主编以来,“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性与政策性”是我从中获益最大、最受鼓舞的一次主题讨论。2009年 6月,来自北京、上海的三十几位国际问题学者聚会京郊,就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可谓精彩纷呈,观点聚焦。会后,九位处在理论和政策研究前沿的国内中青年学者提交了论文。约瑟夫·奈和李侃如这两位集深厚学养与从政经验于一身的美国学者,也欣然同意让本刊翻译发表他们各自的相关文章,贡献于本次讨论。在此不揣冒昧,就十一篇文章的观点做一个肤浅的梳理与评述,以为引言。

一、症结何在?

本次讨论的“引子”,是余万里等中国学者注意到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

2009年4月发表于《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¹ 这篇文章的要旨,是当代美国的政治学与国际问题学者过于脱离现实政治,其绝大多数研究成果既无法影响公共政策,也无法产生社会效应,而只是在一个很小的学术圈子里闭门造车。奈呼吁美国大学的相关院系重视政治实践,理论要联系实际、联系政策,要鼓励青年政治学者面向世界;学术刊物要多刊登有政策意义的成果。此前,奈在2008年发表了题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一篇长文(本期刊出)。他注意到奥巴马政府在组阁时任用了相当一批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而只有很少的政治学家加入政府,于是对美国政治学者在政界处于“靠边站”地位的趋势深感不安,遂为《华盛顿邮报》撰文,以引起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

许多中国学者认识到,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离的现象由来已久。近十多年来,国际问题研究成果的数量剧增,其中理论著述和同政策相关的著述同步增长。与此同时,一批国际政治领域的学者受到政府外事部门的咨询,更多地面向政策实际。但是,中国国际问题领域的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各有其明显缺陷。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成果难脱西方理论的窠臼,鲜有创新;政策研究则往往成为现实政治现象的归纳或对现行政策的诠释,浮在表面,缺乏学术理论的支撑。对于这种现状,国内学者多有不满。

在2009年6月的研讨会上,我对32名国内中青年学者作了一个问卷调查。关于国际政治领域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关系,有19人(59%)认为目前的状况是两者相互脱节;同时,也有8人(25%)认为二者本应保持一定距离,以免相互干扰。对于国内学者评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工作,有20人(63%)认为“已经够多了,今后应着重实证研究”,还有2人认为引进西方理论“是一种资源浪费,并使中国学者和学生受到了不良影响”。认为评介西方理论“还不够,应开拓广度和深度,加强理解”的则有8人(25%)。从这一调查结果看,相当多的国内学者对学术研究同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现象不满,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归咎于我们把太多的精力用在了评介西方理论上,而对“中国问题”研究不足。就此而言,奈所诊断的美国政治学界的病症,已经传染到中国;那么,他所开出的药方,可否为我们所借用?

参加本次主题讨论的国内学者虽然大都承认学术研究同政策研究的互动应当加强,但在涉及到问题症结的时候,却众说纷纭。张志洲对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现状的批评最为深刻。他认为,在过去十多年间,“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界几乎成了西方理论的跑马场和殖民地,许多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著作也不过是对西方理论的注释性解读”。张志洲指出,对具体国际问题的研究,也往往是套用西方理论,观念先行,缺乏政策的敏感性,“充斥着低水平重复研究”。在政策导向的研究

¹ Joseph S. Nye Jr., “Scholars on the Sidelines,” *Washington Post*, April 13, 2009, A15.

方面,通常是被“中国威胁论”、“民主和平论”等西方的论题牵着走。也就是说,张志洲意识到的问题相当严重,远远超出本次主题讨论的范围。不过他的主要批评目标似乎还是“食洋不化”的倾向。¹

于铁军则认为,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中学术研究同政策研究、理论同实践日益脱节的现象,在中国并不明显,而仅仅是“可能成为中国明天的问题”。他说,中美两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现状则是学术研究太少,所谓的政策研究太多。”于铁军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所谓”,但显然对当前政策研究的质量有所怀疑。无独有偶,苏长和用数据指出了学科基础研究同政策研究的严重不平衡状态。他提到,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国际问题研究类最终立项的课题有34个,从课题名称看几乎都是政策研究,其中直接带有“对策”、“策略”字眼的占到近一半。

在政府智库工作的达巍对中国国际问题领域里政策研究现状的评价是:“同美国同行相比,中国政策研究领域研究机构和人员数量少,研究质量不高,参与决策咨询的机会不多,机制化不够。”也就是说,政策研究的主要问题不在课题少而在质量低。但在他眼中,理论研究的缺陷也许更大:“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虽经千呼万唤,但始终未能成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本还停留在西方理论的引进、介绍及根据本土经验的批评与消化。”对这一症结的诊断,达巍同张志洲是一致的。朱锋也指出,“处处跟在欧美国际关系学术界背后亦步亦趋地进行‘理论研究’”是不可取的,必须调整方向。

达巍还澄清了一个中美认知差距,即奈所批评的远离政治现实的学术研究,在美国主要指的是大学中的“学院派”研究,而美国的诸多智库及其中的专家学者,其实是很贴近政策的,并不在奈的指责之列。在中国的语境下,相当一部分政策研究仍然可以而且应该是学术研究。

宋伟对理论与政策制定相脱节现象的解释独树一帜。他认为,理论宏观抽象,而外交政策问题细致具体;国际关系学者希望保持研究的价值中立,所以不热衷于介入外交政策领域。这些都是理论对政策制定缺乏吸引力的根源。但是,“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罪责主要并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实践者”。宋伟强调,症结在于政策制定者“往往缺乏相当专业的学术训练和专业背景,在迈入实际工作之后又没有时间、或者厌倦深入的理论学习”。

不过,正如约瑟夫·奈和李侃如根据自己的从政经验所指出的,美国外交决策

¹ 针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引进西方理论方面的缺陷,周方银、王子昌在一篇文章中进行了剖析,指出一些学术文章对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三大理论范式进行非常简单化且似是而非的批评,而对它们提出的现实经验问题并未给予更为有效的解释。周方银参加了6月的主题研讨会,可惜并未在会上提出类似的尖锐意见。参见周方银、王子昌:《三大主义式论文可以休矣:论国际关系理论的运用与综合》《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1期。

者对理论的一般态度是轻视甚或反感。¹ 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也很难设想中国的外交决策者会从系统学习过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的人群中间产生,或者在工作实践中有时间和兴趣去钻研这些学术问题。^④ 更不消说,由于国际战略的最高决策者同时也是国内政策的最高决策者,要求他们通晓各个内外政策领域里的理论问题是完全不现实的。

熊焯没有从“大理论”切入,而是更多地从中观的角度分析各国“外交学被边缘化”及“外交衰落”的趋势。冷战结束后,金融、贸易、能源、气候变化等功能性议题占据国际政治中心地位,外交部门功能萎缩,无法垄断外交工作,外交政策不断被掏空内容,“传统外交方式显得不合时宜”。他指出,一方面,中国外交体制日趋理性化、科层分明、分工精细;另一方面,外交决策和执行体制又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分权与扩散,对中国外交制度形成“双重挑战”。

王栋看到的则是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关系中的“双重困境”,即理论研究的贫困和政策研究的空白在中国学术界同时出现。他说,这就好比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就出现了“后现代”问题。同张志洲、达巍、朱锋等作者观点相通的是,王栋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是“太理论”,而是“不够理论”,或者说徒有引介西方理论的“表”,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创新的“里”。

王栋、达巍和苏长和都不约而同地指出,政府部门这些年来在重大决策与实践上远远走在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界前面。学者的政策研究常常不是引领政策,而是对政府开创的外交局面和已经发表的政策宣示加以阐释和辩护。对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王栋在一个注释中做了说明。他说,许多中国外交议题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敏感性,使学者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政治正确”内化到政策分析中。越靠近政策,这种紧张就越明显。而学者关注政策议题、希望参与政策讨论的愿望越迫切,就越容易沦入这一潜在陷阱。达巍说,除了在政策研究方面的思想解放仍不到位以外,学者还要顾忌网络民意的“政治正确”问题。媒体对于学者发表个人政见既是诱惑,又是压力。^④

综上所述,参与本次主题讨论的学者视角各异,但对于中国的国际问题学术研究脱离现实、落后于政策的症状,作出的诊断是大体一致的:第一,国内的学术理论

¹ 奈在本期刊载的论文中引用曾经参政的美国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的话说:“一般来说,学术书籍和文章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毫无用处。……他们实在没有时间在里边大海捞针般寻找对他们可能有用的东西。”

^④ 在1980年代,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和驻美大使的章文晋先生出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他在一次同北大师生的座谈会上坦言,自己在外交生涯中从未读过任何一部国际政治方面的学术论著。但是,章大使的文化素质值得景仰。当今中国也不乏有学养的高级外交官。问题在于如何论证现存国际政治理论能够对外交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决策者有必要加以学习吸取。

^④ 这一问题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在前引约瑟夫·奈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短文和本期刊载的长文中,他均呼吁美国刊物、学校和学术界更加宽容“不受欢迎的政策立场”(greater toleration of unpopular policy positions)。

研究跟随于西方理论特别是美国理论之后,引进多,创新少。第二,政策研究方面的课题虽多,但存在低水平重复现象,学术含量不高,又往往被西方设定的议题牵着走。第三,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政策研究,都存在“问题意识缺失”的现象。正如王栋所说,高质量的研究当然是“问题驱动”,而不是理论驱动或方法驱动。套用“三大理论范式”去解释诸多国际政治现象,也是问题意识缺失的一种表现。第四,相当一部分国内学者对参与政策研讨是有兴趣的,只是缺少相关政策资料及参与渠道和机会。¹ 第五,虽然国内舆论环境大有改善,但“政治禁忌”问题仍然萦绕在学者心头。^④ 囿于环境压力,对于敏感的政策问题,尤其是涉及国内政治的敏感问题,学者往往采取“退避三舍”的态度。近些年来,已有不少学者由于发表了与部分“网络民意”相左的评论,而在网上遭受粗暴的个人攻击。相对而言,做一些不痛不痒的理论题目或大而化之的政策诠释更安全保险。这一氛围,对学者研究方向和观点倾向的选择,不可能不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出路何在?

本次主题讨论的参与者为国际问题研究的缺失开出了不同药方。归纳起来,学者们提出了以下几个思路。

(一) 构筑中层理论

我在6月研讨会的问卷调查中,咨询了32位学者对“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这一命题的态度。只有6位(19%)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努力方向,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多达23位(72%)的学者则对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命题有怀疑,或认为它是一个错误命题,无法深入研究下去。根据这一调查结果可以推测,这一领域的中国学者大多对创建宏大理论体系缺乏兴趣和信心。

但是,不言而喻的是,政策研究是需要理论指导的。王栋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证,还引用中央外办副主任裘援平的话,来说明外交决策部门迫切需要学者提供政策的理论支撑。宋伟强调,确定国际关系中的核心因素和主要矛盾,对于中国的国家战略定位和政策选择至关重要。王栋、达巍、张志洲等论者则没有在设计“大理

¹ 我在6月份的问卷调查中问到与会学者对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个人偏好问题。回答“更侧重学术研究,对政策研究有距离感,兴趣不大”的有7人(22%);“侧重政策研究,觉得抽象的、纯理论的学术探讨意义不大”的有4人,(12%);“目前侧重学术研究,但对政策研究有兴趣,只是缺乏资料和参与的机会”的有11人,(34%),“两者并重,相互促进”的有8人(25%)。这个结果同我个人平常的观察相符,即真正对政策研究兴趣不大的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并不多见。

^④ 在上述调查中,与会学者对朝核问题的态度同所谓“网络民意”的差距相当大。

论”方面下功夫,而是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中层理论”(也有作者称之为中观理论、中型理论或中程理论)的构筑。达巍说,一些中观层次的理论特别是外交政策理论,如威慑理论、危机管理理论、决策理论,可以直接为具体的国家决策服务。于铁军并以美国学者亚历山大·乔治的成果为例,说明中层理论能够为政策研究作出贡献。熊炜强调“具体的理论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制度主义的外交研究视角。奈指出,中层理论、历史案例研究、地区研究等领域的成果,是决策者最易接受并且对外交实践最有用的。

(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构筑中层理论与研究现实问题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构筑中层理论是为了挖掘现实问题的研究深度和普遍规律,而现实案例的研究反过来又为中层理论夯实了基础。

朱锋和王栋都引用了胡适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朱锋建言,“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政策研究’应该成为今后国际关系学界的重点研究领域”。他还说,“只有面向政策的学术研究,才能让学者真正去发现和掌握发展理论的新的经验事实,理论研究才能随时从现实获取源源不断动力”。朱锋主张建立学术机构和决策机构的良性互动,而他本人就是这方面的身体力行者。

关键在于要“多研究些”的是哪些问题。达巍等人提出,既要研究“是什么”的问题,更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后者比前者的难度要大。国内学者研究的往往是比较宽泛的问题(issue),而未能将研究细化、专门化,提出具体的问题(question)。正如朱锋所看到的,“我们不缺少可以在具体问题上‘大而化之’的专家,但特别欠缺可以在大问题上‘小而专之’的专家。”苏长和指出,“中国当代的经验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一个金矿”;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大规模国内国际数据的实学支持,由此需要进行国内外的实地调查,以取得真实数据。达巍也说,对外政策的研究者往往容易忽略在国内的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国情成为“行业通病”。

地区研究、国别研究及外交史研究,都是国内学术界“问题缺失”的领域。其中最重要的课题当属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与现实。肖佳灵曾经评论道:“没有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本身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设,何以谈及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¹熊炜的文章引述了这句话,用以说明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对于推动外交学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理论构建,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在美国,历史案例和地区国别研究是学者提供政策咨询的重要基础。于铁军的论文详细提供了美国外交

¹ 肖佳灵:《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国际论坛》2008年第2期,第1页。

史学家欧内斯特·梅和东亚问题专家白鲁恂的学术经历,以及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王栋也指出,国际关系学科普遍存在忽视历史训练的倾向,建议“重建历史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

张志洲提出的思路有所不同。他主张“既要研究问题,又要思考主义”。张志洲同其他作者一样,提倡加强“中国问题意识”,但同时更强调在理论构建中应当反映中国的国际观或国际政治哲学。他认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都涉及价值和伦理问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当然也不能回避国际社会的正义问题与和谐性追求。

其实,王栋在主张“少谈些主义”(我理解他指的是所谓三大理论范式中的那种“主义”)的同时,也没有回避价值观意义上的“主义”。他指出,中国学者在国际问题研究中缺少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如果中国学者无法贡献真正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很难想象中国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全球性领导国家。虽然张志洲和王栋都谈到了国际政治哲学,但强调的侧面有所不同。我的解读是,王栋的侧重点在同国际社会趋同的普世价值取向,而张志洲强调的是发展有别于西方价值的中国政治哲学。就此而言,张志洲要思考的“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即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应当提倡的“主义”包括哪些价值内涵?

(三) 调整学者的角色和使命,掌握政策咨询的要诀

提高学者本身的学术素质、政治观察力和参与政策研讨的能力,是弥合学术研究 & 政策研究差距的重要途径。长期埋头读书上网,辛劳写作,固然是提高自身素质所必不可少的,但研究国际问题特别是政策问题,必须走出书斋,走出国门。近年来,国际关系学者“走出去”和参与政策研讨的机会越来越多。学者的社会角色更丰满了,使命感也增强了。读书讲究方法,政策调研与咨询也同样要讲究方法。遗憾的是,本次主题研讨在如何改进调研方法、了解决策需要、提供更好的政策报告方面,还没有深入展开。

不过,余万里和达巍的文章已经带了一个好头。余万里强调,国际问题学者应当对自己在公共政策中的角色与功能有必要的了解和认识,界定了学者参与决策过程的五种角色。达巍则阐明了研究人员的专业化和分工协作的必要性,就增强政界、学界、商界、媒体之间的互动交流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在弥合学界与政界的鸿沟方面,美国学者奈和李侃如的文章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知识和建议。就学者(以及有学者背景的官员)参与政策研讨和决策而言,美国走在其他国家前面。更为特殊的是,参政之后他们又重回学界(有的期待再次参政),而其他国家的学者从政大多是单向的,官员任教往往是讲座式的或象征性的。因此,这些美国学者的意见相对来说更为客观而中肯。

如果读者对学者参政有兴趣,奈和李侃如的两篇文章值得反复研读。奈指出,

学者应当了解,从学与从政完全是两种文化,两种判断优劣的标准。两位美国学者分别谈到,在学术界,剽窃是最严重的犯罪;但在政府决策中,观点是公共品,一般不应归功于个人。没有哪个行政部门会公开承认它采纳了某位学者提出的观点。¹ 学术界的最高价值是讲真话,而在决策圈必须“绕着弯儿”表述观点,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不要跟政府观点直接对着干。学术文章要反复推敲、长篇大论,而政策报告要讲求时效和实效,言简意赅,通常只有一两页的篇幅。决策者没有时间和兴趣去看学术论著,但却经常阅读报刊专栏,所以学者影响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媒体上发表意见。政府的工作层次是一个巨大的造纸机器,每天出产大量文件,但是到了决策高层,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一种“口头文化”,所以口头语言表达能力至关重要。诸如此类,似乎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经验之谈,属于“术”的范畴。但所谓“魔鬼存在于细节中”,掌握政策咨询的要诀,是学者调整自身角色的必经之路。

三、若干浅见

本期主题讨论对我个人的思想触动和启发很大。研读与评述之后,还想发表几点个人感想,但愿不是画蛇添足。

如果将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于1948年初版作为一个标志,60多年来国际政治学的理论发展经历了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和全球化加速的进程,一直在与时俱进。奈在本文中归纳了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如何从时代变迁中产生,某些理论又如何迅速落后于时代,值得我们参考。国际政治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真正发展起来,则是近30年来的事。从1980年代初试图固守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到1990年代的“西方理论热”,再到今天的“建立问题意识”,这一学科在跨越式地发展,迅速地从“国际化”迈向“中国化”。诚如王栋所言,我们的理论和方法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就出现了“后现代”的问题。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使我们有条件避免走西方(主要指美国)学科发展走过的弯路。

当然,走捷径必须看准方向。对于美国学者走过的弯路,我们应当“旁观者清”。我曾经翻译过《大英百科全书》1977年版中由麦克利兰德(Charles A. McLelland)撰写的“国际关系理论”词条。这一长篇词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

¹ 据我所知,美国对华政策的许多思路和提法都是学者专家或工作层次的官员首先倡议的,而他们出于各种考虑,一般都不会夸耀个人角色,说“这个主意是我出的”。一旦进入受咨询的专家圈子,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都需谨言慎行,否则就可能出局。这同我们印象中美国人喜欢突出个人作用、特立独行的处事风格有很大差异。我个人所知道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2005年关于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提法,是国务院的一位来自学界的年轻官员首创的。当我私下向这位官员证实此事时,他只是微笑了一下。

个观点：“在课堂上提出‘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就相当于在课堂上提出‘什么是生物学理论’的问题。对于后一个问题的明显答复不是一个叙述性的说明，而是另一个问题：‘你心里想的是生物学的哪一个分支或者哪一个方面？’今天，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的问题，做出的答案必然是类似的。”¹当我们思考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时候，应当知道麦克利兰德在 30 多年前就给出的关于“什么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回答。中层理论早就应该成为我们理论建设的重点了。

我想还应该做出这样一个对比，即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对恒定的，而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发生剧烈变化的。因此，国际政治学在不断拓展其分支领域和交叉学科，知识更新很快，理论创新肯定要大大落后于实践。在建构主义（与其说它是一种理论，不如说它是一种研究方法）时兴 20 多年之后，在西方还没有出现有较大影响的宏观理论成果。虽不能就此断言“宏大理论的终结”，但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根据世界政治变化和中国面临的内外环境进行认真务实的反思，此其时矣。本期主题讨论提出了一些很严肃中肯的问题，也开辟了一些新思路，希望它能够成为这次反思的一个新起点。

依我浅见，在搭建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桥梁的过程中，至少有三大难题是学术界无力单独破解的。第一大难题涉及中国“大战略”的价值取向，即张志洲提出的国际政治哲学问题，也即王栋谈到的中国能够贡献什么样的普世价值和国际公共产品的问题。其实，毛泽东时代的世界革命思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体现了一些明显的普世价值。比如，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灭战争，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正义和平等，都是那个时代被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用当年流行的语言来解释，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那个时代中国在国际上的价值取向，同国内意识形态是基本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坚持的道义原则，则主要是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尽可能不涉及其他国家的内政。也就是说，这种国际政治哲学只适用于国家行为体组成的国际社会，而不以其他国家的内部制度或国内政策做出调整为前提和条件。

但是，时代正在重新呼唤普世价值。正如我们在此次全球金融动荡中所看到的，全球化进程，使各国内部秩序和制度产生日益强烈的相互冲击。比如，美国金融监管若进一步失控，势必给中国经济利益带来重大损失。中国要保护在美国金融市场的利益，就必然要求美国改善其国内财政状况，稳定金融秩序。从客观上说，中国正在试图影响美国国内政治。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提高，以及对海外资源需求的扩大，不仅会更多地遇到同现存国际秩序与机制发生碰撞的问题，还会产生同其他国家的国内秩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兼容和摩擦。从长远眼光看，除了继

¹ 《国际关系理论》（《大英百科全书》1977年版第 9卷，麦克利兰德撰写，王缉思译），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辑印发：《政治研究》1986年第 1期，第 88页。

续深化自身改革之外,中国将不得不要求同自己利益发生冲突的国家改革其国内政策,以至部分调整其政治经济制度。实际上,这一进程已经悄然开始。当我们谈论“中国模式”的普世性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我们其实是在期待外国的国内制度“同中国接轨”?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是其国内政治的延续。如果西方国家不对自身制度安排做出调整,如果出现国内动乱的某些发展中国家不能恢复正常秩序,何来和谐世界?既然我们对西方政治价值观持批判态度,那么中国能提供什么样的价值选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采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和发展模式?

以上是一些过于宏大、非学者所能破解的话题,也是现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未涉及的话题。但国际问题研究者要跟上形势发展,就不能不深入思考这些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理论课题。然而无论是本领域学者普遍的知识结构,还是智库和大学相关院系的学科设置,都远远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变化,不能适应政策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新需求。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和加强诸如比较政治学、政治思想、地区国别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非传统安全等方面的研究中心和系科,从通才中培养更多的专家。

第二大难题涉及的是体制操作层面,即学者同行政部门和商界的互动机制。现在主要问题不在于政府单位不熟悉学者和学术机构或缺乏相互沟通的渠道,更不在于缺乏政策咨询的需要,而在于学者方面不够了解决策部门的具体要求和工作部署,提出的政策思路与建议常常是大而化之。另一方面,学者对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国和对象领域的动态,也往往是一知半解,“知己知彼”的两个方面都显不足。正如本次讨论中一些论者所提到的,薄弱环节更多出在对国内问题的知识欠缺上。因此,学者的国内调研亟待加强。在国内和国际调研方面,需要行政部门的引导和支持。

至于行政部门与学者之间建立“旋转门”,我本人一贯持保留态度。美国的“旋转门”是特色产品,不是大国的通例,其他西方大国基本上没有这种安排。如果没有至多四年就大改组一次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府制度、强大的公共社会和专业智库、简单划一的国家意识形态、灵活的人事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较高度度的政府信息公开化,美国也不会建造出“旋转门”来。官员与学者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职业。连约瑟夫·奈也体会到,从学者角色转换到官员不容易,从官员转到学者更难。在中国建立“旋转门”,很可能是南橘北枳。当然,个别学者到行政部门任职也可能做得很好,但这同“旋转门”是两码事。

近年来,国际关系学者同商界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之间的互动大大增加。一方面,商界无限丰富的素材与个案可以成为学者从事政策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学者的广阔视角、战略眼光和人脉关系如果运用得当,可以成为为企业决策的重要参考,甚至给企业带来直接利益。对于学者和学术机构来说,这片丰饶的土壤需要自觉地去挖掘和开拓。将政界、学界、商界的力量凝聚起来,就能够形成推动学科

发展的巨大合力。

第三大难题是达巍所说的“媒体的诱惑和压力”。在6月研讨会上,我咨询了与会学者对国内媒体的国际报道的反应。认为国际报道“不够令人满意,片面性较强,可能使公众对国际大局及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产生不准确的认识”的有20人,占受调查人数的63%;认为其“深度不够,过于迎合大众消费口味,商业性太强”的有11人,占34%。由此可见,国际关系学者的观点与媒体的宣传口径之间差距很大,而学者对媒体的影响大大小于反向的影响。学者需要通过大众传媒和网络向公众发表观点,但其观点又受制于媒体的取舍,这是学者(特别是从事政策研究的学者)无法自我解脱的两难。从学者的角度说,在坚持正确观点和适应媒体需要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似乎是最佳选择。

除了上文提到的媒体和网络给学者造成的舆论氛围以外,学者角色、媒体角色和政策谋士角色的反差和频繁转换也会给学者带来难题。国外许多媒体聘用专业的专栏作家或时事评论员,而在中国媒体,这个角色经常请学者去客串。久而久之,角色很容易错位。当一个重大事件或突发事件发生,学者角色的要求是客观冷静,沉一沉,想一想,在变化中看到连续性和历史长河的阶段性;时事评论员的角色要求则是迅速反应,突出事件的变化和重大意义,观点鲜明,慷慨激昂,吸引受众的注意;政策谋士角色的要求是既要有长远眼光,更要捕捉新动向,提出新的行动建议。学者在报刊编辑的催促下,在镜头和话筒面前,很难抑制时事评论员式的冲动。于是我们看到,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一些经济学者马上断言这场危机的深度将超过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个别政治学者迅速断言其国际政治冲击力将超过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类的仓促结论如果对政府决策造成影响,其后果可想而知。

上述三大难题虽非学者单方面可以破解,但学者通过自律、审慎和加深学养,是可以在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两个方面同时取得重大进展的。“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与其静待宏观研究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不如主动塑造环境,从自己和小单位做起。

ARTICLES

How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Scholarly Research and Policy-oriented Studies in IR *Wang Jisi* (1)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 China are troubled by the lack of both creative theories and relevance to policy. In the symposium of 9 articles by Chinese IR scholars, symptoms found and prescriptions given vary. After making remarks on the other articles, this author argues that creative thinking and sensible policy advice can be generated by applying mid-level theories to Chinese realities. IR scholars should reach out to policy circles and the business community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 world. In interacting with the media, however, scholars should be conscious of their independent identity and not be inflated by short-term popular needs.

Overcoming the Dual Dilemma: A Discussion of Theory and Policy in Chine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ng Dong* (12)

The Chines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faces a dual dilemma in the proposition of theory and policy. First, the formation of theory in Chine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still incomplete. Second, Chinese IR scholars also face what Stephen M. Wall, Joseph S. Nye, Jr., and others call the challenge of "returning to policy". Ways to overcome these challenges include promotion of empirical research, improvement of the intellectual and academic quality of policy study, revival and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y's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focus on the nurturing of future decision-makers.

Academic Studies of Policy: Pathways and Approaches *Zhu Feng* (29)

At present, area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China are very weak. Furthermore, China also faces practical issues such as how to handle relation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nd how to make effective strategie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All these issues require scholar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improve academic studies of policy.

From "Mutual Disregard" to "Mutual Reliance": Connecting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Su Changhe* (40)

Mutual reliance and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cademia as well as between policy studies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are an in-